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

90年中人与事

共和国成长轨迹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首席专家 刘陈德

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 编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90年中人与事

共和国成长轨迹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首席专家 刘陈德

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 编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共和国成长轨迹 / 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编著. — 北京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6

(90 年中人与事)

ISBN 978 - 7 - 5300 - 0311 - 4

I. ①共… II. ①北…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 IV. ①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7710 号

90 年中人与事

共和国成长轨迹

GONGHEGUO CHENGZHANG GUIJI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首席专家 刘陈德

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 编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7.5 印张 134 千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0 - 0311 - 4

定价: 23.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文库》

编 委 会

主 任 傅 华 史秋秋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力 史秋秋 曲 仲 刘陈德 李翠玲

张静如 陈之昌 姚 桓 崔新建 傅 华

总 前 言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90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90年，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辉煌成就的90年，是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经受住各种风险和挑战考验、不断发展壮大的90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策划、组织、编写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和《90年中人与事》三个系列，共18种作品近700万字。《文库》旨在从党史、党建和奋斗中的共产党人三种不同视角，反映9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文库》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庆祝建党90周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重点出版物。

为做好《文库》的组织编写工作，确保《文库》及时、高质量地出版，成立了以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傅华和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史秋秋为主任的《文库》编委会。编委会组建伊始，就对《文库》的编写提出了明确的政治要求和学术规范，强调书稿撰写要有政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基本史实、基本观点准确，既要体现近年来研究的新材料、新进展，又要有新视角、新观点，以确保《文库》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知识性，将《文库》打造成精品。《文库》的编写组织工作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我们聘请了党史、党建领域的著名学者张静如、姚桓、刘陈德分别担任《中国共产党辉煌90年》、《中国共产党建设90年》、《90年中人与事》的首席专家，负责对具体选题、作者队伍、内容框架以及时间进度把关，并负责最

后统稿、定稿等工作。这三位首席专家既是组织者，又是作者中的一员。他们尽职尽责，不辞辛苦，付出了大量心血。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或工作之余，认真研究，勤奋写作，保证了书稿的按时交付。《文库》或许还未臻完美，但确是作者潜心研究和深入思考的成果。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对《文库》的编辑出版高度重视，给予了指导和支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办公室不仅具体承担了《文库》的策划、组织、统筹协调等日常工作，还为《文库》的撰写和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北京出版集团领导和该集团人文社科图书出版事业部的编辑团队，为《文库》的顺利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在《文库》即将付梓之际，我们对上述单位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期望《文库》能够为党史知识和党建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普及发挥应有的作用，期待广大读者对《文库》给予批评指正。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文库》编委会

2011年5月18日



◎题 记 /1

◎奠基之役（1953年至1957年）/3

从稳定社会动荡中起步 /3

要“四路进兵”，不要四面出击 /4

怎么向社会主义过渡 /5

一条贯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6

第一个五年计划干什么 /7

发展重点的争论 /8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选择 /9

重点项目搭起工业体系的基本骨架 /9

两个“一升一降”见端倪 /10

◎曲之必东（1958年至1965年）/13

提早完成工业化 /13

反保守与反冒进的平衡 /14

“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 /15

计划指标一改再改 /15

纠“左”与反右的反复 /16

五年计划八年才完成 /17

调整什么，怎么调整 /18

发展亮点让世界瞩目 /18

◎备战备荒（1966年至1970年）/21

“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 /21

“两个拳头、一个屁股” /22

御敌除患建三线 /23



有骨有肉的计划 /24
打与不打进退自如 /25
富有远见的重大战略 /26
社会动荡中的经济前行 /27

◎逆水行舟（1971年至1975年）/30

一份先天不足的计划 /30
“四五”期间的中心任务 /31
整顿纠偏初见成效 /32
“四三方案”向西方发达国家敞开国门 /33
大刀阔斧进行第二次整顿 /35
生育也是计划问题 /35
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起步 /36

◎伟大转折（1976年至1980年）/39

没有独立文本的五年计划 /39
中国发展道路的再选择 /40
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 /41
共和国发展的新起点 /42
调整是纠偏，更是为了加速发展 /43
改革开放在自我反思中起步 /44

◎探索新路（1981年至1985年）/47

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深刻转变 /47
第一个以小康为目标的五年计划 /48
从单纯发展经济到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49
重视经济效益成为整个计划的灵魂 /50
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推进 /51
由单一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 /52

逐步告别短缺经济时代 /53

◎攻坚克难（1986年至1990年）/56

改革进入新的闯关阶段 /56

“七五”计划的三大亮点 /57

正确处理改革、建设和生活的关系 /58

放慢速度为改革营造宽松环境 /59

计划与市场论争尘埃落定 /60

“价格闯关”与治理整顿 /62

◎加快推进（1991年至1995年）/65

既要治理整顿也要改革发展 /65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66

一个着眼未来、留有余地的规划 /68

发展速度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69

调整计划以加快速度、优化结构 /70

改革发展驶入“快车道” /71

◎两大转变（1996年至2000年）/74

新形势提出了新问题 /74

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 /75

“点刹”实现经济“软着陆” /76

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矛盾的双重冲击 /77

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 /78

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翼 /79

在调控中继续推进改革发展 /80

◎全面发展（2001年至2005年）/83

新世纪面临新挑战、新考验 /83



第一个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编制的五年计划 /84

一个充满创新与人文关怀的计划 /85

为什么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86

加快发展更要全面发展 /87

改革攻坚取得新突破 /88

科学发展观初露端倪 /89

◎和谐蓝图（2006年至2010年）/9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91

从“计划”到“规划”之变 /92

令人耳目一新的规划编制 /93

中国农民彻底告别“皇粮国税” /94

描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 /95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 /96

科学发展观成为灵魂 /98

◎走向回眸（1949年至2010年）/100

论十大关系：探索科学发展道路的起点 /100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追求社会领域的以人为本发展 /10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发展营造和谐外部环境的基本准则 /102

解放思想：为科学发展破除精神枷锁 /103

社会主义本质论：为科学发展指明方向性目标 /10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科学发展标明阶段性特征 /104

对外开放战略：为科学发展谋求方法论支持 /105

正确处理十二大关系：解决好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 /106

政治文明：构筑“三个文明”全面协调发展的体系 /107

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思想 /107

◎后 记 /109

题 记

“五年计划”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总蓝图。6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制定与实施了11个“五年计划”。

回顾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推进，探寻经济发展、国家进步背后的思想脉络，不仅能让人清晰地看到共和国成长的历史轨迹，而且能让人感受到中华民族复兴路上的风风雨雨、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探索发展的曲曲折折。

奠基之役（1953年至1957年）

1949年10月1日，在亚洲东部，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然而，这个有着四万万人口的大国经济上却是一穷二白。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当时的统计：1949年，新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亚洲人均收入44美元的2/3；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仅占17%。

面对当时的复杂形式和种种困难，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

从稳定社会动荡中起步

当共和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时候，解放全中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国家并不稳定。敌人的反攻倒算和物价飞涨，成为社会动荡、人心不定的两大毒瘤，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在华南、西南和沿海岛屿，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大批特务同当地土匪、恶霸势力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相互勾结，从事各种破坏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生妄图颠覆新生政权的武装暴乱816起。为了打击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保证土地改革和生产恢复的顺利进行，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解放全国，是为至要”的指示，大举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收编改造170余万起义投诚人员。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明确打击的重点对象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三年间，全国共关押反革命分子129万人，管制123万人，被依法处决的各类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71万人，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在政治上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生政权。

新中国成立时，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是一个经济萧条、失业率高、金融混乱、物价飞涨的烂摊子。1949年7月，由于国民党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当时



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陷于缺粮的困境，一个月里米价上涨了四倍，并连带影响到华东、华北和中南米价同时上涨。10月，正逢秋后国家需要大量资金收购粮棉之际，社会上的不法投机商却趁国家财政困难之机大肆囤积粮食、抢购棉纱和其他工业原料，掀起一次又一次物价风潮。为平抑物价、稳定人心，党中央首先在上海打响了“粮棉之战”。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陈云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在上海，主要由于棉纱短缺，引起投机势力的囤积；而华北受灾，棉产区粮食很贵，北方的投机势力很可能集中冲击粮食。为避免两面受敌，陈云双管齐下，一手抓东北粮食调运，保证每天有一个运粮专列抵达北京，积囤存粮，稳定了华北市场；一手抓上海物资储备，源源不断的棉纱、粮食从全国各地运往上海。1950年春节前夕，上海等地的不法资本家和投机势力开始大量囤积粮食，以期在正月初五“红盘”开市时大捞一把。不料春节过后粮价连续下跌，新开设的国家粮店连续抛售大米两亿多斤，逼得投机商不得不赔本把囤积的大米吐了出来。

打击投机资本，只是稳定物价的一个方面。为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党和政府针对当时中央财政收支不平衡和收支机关脱节的情况，采取果断措施，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统一全国物资管理、统一现金管理，彻底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连年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问题，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要“四路进兵”，不要四面出击

在稳定物价的过程中，各地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四路进兵”：冻结贷款、不准停业、严加征税、催缴公债。抑制通货膨胀之后，过去虚假的社会购买力骤然消失。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普遍出现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和部分私营工商户关门、歇业等问题，加剧了资本家与人民政府之间的敌对情绪。据上海税务局报告：补税增税的款子收不上来；资本家“躺倒”不干，工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当时，上海的失业工人有20万，全国大约有100万工人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有的工人拿不到工资，就分厂分店，甚至发生抢糕饼铺、游行请愿、撕毁领袖像的事件。经济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定，转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

而在党内，一部分干部在稳定物价斗争中主张乘胜挤垮资产阶级，早日实

现社会主义，加剧了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阶层间的紧张关系。

面对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紧张问题和党内的错误倾向，如何稳定社会环境，成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先决条件。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指明了维护稳定的战略策略方针。他指出，我们当前总的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思想，使全党在复杂的形势和任务面前，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和行动，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奠定了基础。

怎么向社会主义过渡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无论在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社会都不是一下子可以建成的，无产阶级在推翻了反动统治、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之前，都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从1949年开始考虑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决议，先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到先进的工业国，再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1952年，毛泽东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作出一个新的判断。他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一年地增加，争取用10~15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完成这一过渡。而不是等到10~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

毛泽东的这个构想，其战略目标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完全一致，但在战略步骤上已经有了新的部署，这就是不要等待，而是充分利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经济、政治条件，从现在开始，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



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不仅参考了苏联的经验，而且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1952年10月20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受毛泽东委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对我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的时间和能够实现的条件，进行了估算和分析。10月24日，斯大林接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一条贯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经中央多次开会讨论，并对有关的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到12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被毛泽东称为“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强调，要反对党内存在的两种倾向：有人认为过渡时间太长了，对基建、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发生了急躁情绪，“五反”以后对资本家的进攻没有停止。无止境、无目标地进攻，使工人阶级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

从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的任务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体。而对农业、手工业的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又是两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比喻的那样，总路线好比一只鸟，这只鸟的主体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它的一双翅膀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没有主体是不行的，但一双翅膀也非常重要，必须使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密切配合、协调发展。改造个体经济与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应该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

1954年2月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



总路线，并将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第一个五年计划干什么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形式。短期计划是年度计划，中期计划是五年计划，而长期计划指的是十年以上计划。作为指导执行年度计划和落实长期计划的中间环节，五年计划更有利于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规定目标和方向，因而成为我国60年不变的模式。

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制定的。其基本任务是建立“三个基础”，即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根据“一五”计划确定的基本任务，五年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数为766.4亿元（折合7亿多两黄金），其中用于基本建设的投资为427.4亿元，占总支出的55.8%。在基本建设投资中，工业是重点，占58.2%；农林、水利占7.6%；运输和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占3.7%。用这样大比重的资金来进行国家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壮举。

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执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从未实践过，编制切实可行的五年计划更是头一回。薄一波在回忆录中说：“老实说，在编制‘一五’计划之初，我们对工业建设应当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怎样做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配合，还不大明白。”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在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小组领导下，开始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粗线条的试编工作。

由于缺乏编制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并且统计资料严重不足，对国内资源状况不明，对原有企业的生产能力不太清楚，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只能采取“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办法，不断进行修订、调整、补充，历时